

红绿辉映：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四维整合模式与实践逻辑——基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的案例研究

作者

杨姗 王宇 房厦

通讯作者

房厦 Email: fangsha@szpu.edu.cn

收稿：2025年10月9日

评审：2025年10月26日

接受：2025年11月3日

发表：2025年11月25日

引用

杨姗, 王宇, 房厦. (2025). 红绿辉映：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四维整合模式与实践逻辑——基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的案例研究. *全球职业教育案例与实践*, 01 (03). 145-167

DOI: <http://doi.org/10.64345/964281753>

项目支持

基金项目：本论文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红绿辉映：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四维整合模式与实践逻辑——基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的案例研究

杨姗^a, 王宇^b, 房厦^c

^a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摘要

本研究聚焦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成效，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为案例，采用单案例深度分析法，结合文献研究、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探究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模式。研究发现，“筑梦乡野”突击队构建了“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银发关爱、童心守护”的四维整合模式，实现了文化传承、产业振兴、社会服务与教育帮扶的有机统一。该模式通过精准需求对接、差异化协同机制、校地共建长效机制等保障措施，有效提升了服务成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本科教育在红色文化解读、产业诊断、服务评估和课程设计等高阶任务中展现出独特价值，与高职教育形成互补关系。本研究拓展了产教融合理论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应用边界，丰富了服务学习理论的本土化实践模式，构建了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化分析框架。研究结论为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对促进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职业院校；乡村振兴；四维整合模式；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学习；产教融合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对乡村人才需求提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新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因其与产业、区域发展的紧密联系，成为服务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随着《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的出台，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高阶形态，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日益凸显（彭洪莉 & 朱德全，2022；徐春梅 & 吕莉敏，2022）。

当前，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服务模式单一，多集中于短期项目或单一领域，缺乏系统性；梁裕 & 韦大字（2021）指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往往停留在表层，未能形成深度融入的长效机制；二是持续性不足，“三下乡”等活动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三是专业与需求脱节，未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专业优势；周名力（2025）研究表明，高职院校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供需错配”问题，专业设置与乡村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四是职业本科与高职教育的特色区分不明显，未能体现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差异化价值。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试点院校，其管理学院“筑梦乡野”突击队连续三年赴河源市和平县古寨镇开展“三下乡”活动，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银发关爱、童心守护”为路径，形成了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可持续性强的工作模式。这一实践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新思路。唐菁菁 & 林孝锴（2015）在研究高校“三下乡”活动时指出，成功的社会实践项目往往具备系统设计、长期投入和多方协同的特点，而“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恰好体现了这些特征。

因此，本研究聚焦于职业院校如何构建系统化、可持续的服务乡村振兴模式及其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特别关注职业本科教育在其中的独特角色。通过深入剖析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案例，探索可迁移的经验模式，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为典型案例，探索可迁移的经验模式。本研究首次系统构建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四维整合”模式，揭示红色文化传承、绿色产业赋能、社会服务与教育帮扶的协同机制及其可持续发展路径，突破以往研究仅关注单一维度的局限，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系统化理论框架。特别地，本研究聚焦职业本科教育在乡村

振兴中的独特价值，通过分析其与高职教育的差异化贡献，为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提供实证支持。这一创新不仅体现在理论框架的构建上，更在于通过“童心守护”等具体实践（如古寨学校支教活动）揭示了职业本科学生在课程设计、教学实施中展现出的高阶能力特征，为理解职业本科教育的独特价值提供了微观实证。宋亚峰, 范翔瑜 & 陈思吉（2025）在研究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时指出，目前缺乏对其在具体社会服务领域表现的深入研究，本研究恰好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本研究致力于揭示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化路径，突破以往研究仅关注单一维度的局限，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在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深度剖析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案例，将丰富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特别地，通过区分职业本科与高职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不同功能与价值，有助于构建更加精细化的职业教育类型化理论，拓展产教融合、服务学习等理论在乡村振兴语境下的应用边界（李博，2020）。匡瑛 & 李琪（2021）指出，职业本科教育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亟需通过实践案例来验证和丰富相关理论。

在实践层面，研究提炼的“四维整合”模式为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通过分析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具体实践，特别是其作为职业本科院校如何发挥高阶能力优势，为其他职业院校提供了操作性强的实践指南。同时，该模式有助于职业院校更精准地对接乡村振兴需求，提升服务效能。杨欣斌（2022）强调，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对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在政策层面，彭洪莉 & 朱德全（2022）曾指出，政策制定需要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以确保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可为教育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特别是在当前职业本科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可为如何引导职业本科院校发挥其研究能力、创新思维和系统规划优势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参考，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政策体系。

1.3 研究方法 with 案例选取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范式下的案例研究法，聚焦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案例。案例研究法适用于对现实情境中复杂且具体的现象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实地考察，尤其适合回答“如何（how）”与“为何（why）”等类型的问题（孙海法

等, 2004)。该方法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多源证据的交叉验证, 系统呈现现象背后的动因与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构建。本研究选取“筑梦乡野”突击队作为研究对象, 因其在探索职业院校特别是职业本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化路径方面, 具备典型性与代表性, 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丰富而完整的经验材料。

具体而言, 本案例的选择基于其与研究核心问题的高度契合, 使其在阐释职业本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这一现象时具备充分代表性。首先,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试点院校, 在职业教育领域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其管理学院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经验, 其实践具备一定的示范价值。其次, “筑梦乡野”突击队连续三年赴河源市和平县古寨镇开展“三下乡”活动, 实现了从“短期走访”到“长期驻点”的转变, 校地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职业院校中具有代表性。更为关键的是, 该突击队突破了传统“三下乡”活动的单一维度, 创新性地构建了“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银发关爱、童心守护”的四维整合模式, 将文化遗产、产业振兴、社会服务与教育帮扶有机融合, 这一创新实践正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同时, 该突击队在服务成效方面表现突出: 累计走访红色遗址8处, 服务老人36人次, 惠及200余名留守儿童, 获十余家主流媒体报道, 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成果展示, 其成功经验具有可分析、可借鉴的实证基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该突击队由职业本科学生与高职学生共同组成, 形成了差异化协同的服务模式, 为研究职业本科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提供了理想场景。

为保障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严格遵循案例研究的方法论要求, 通过多元渠道系统收集了一手与二手资料, 以构建完整的“证据三角”与闭合的证据链(孙海法等, 2004)。一手资料主要包括: (1) 深度访谈记录: 对关键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涵盖突击队指导教师3名、学生骨干5名(其中职业本科学生3名, 高职学生2名)、古寨镇村干部4名、受益村民8名(包括4位接受服务的老人和4位儿童家长), 重点了解各方对服务模式的想法、体验与评价, 特别关注职业本科与高职学生的差异化贡献; (2) 参与式观察记录: 研究者于2023年暑期在河源市和平县古寨镇进行了为期5天的参与式观察, 全程记录九连“小延安”红色文化宣讲活动、古寨学校支教活动以及敬老组家访独居老人活动, 详细记录活动流程、人员互动、任务分配等细节, 特别关注职业本科学生在方案设计、内容创作、现场指导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二手资料主要包括: (1) 突击队项目文件: 包括“九连小延安宣讲策划案”、“古寨支教”方案、“敬老组一家访独居老

人策划案”等详细活动方案；（2）成果材料：包括红色文化纪录片（被“学习强国”转载）、文创产品设计图、媒体报道资料、突击队三年活动总结报告等；（3）相关档案记录：包括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表、队员实践心得、校地合作协议等。通过对上述多来源、多类型数据的交叉分析与整合，本研究致力于全面、客观、深入地还原“筑梦乡野”突击队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图景，揭示职业院校特别是职业本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关键机制，从而为理论构建和实践推广提供科学、扎实的实证支撑。

2. 案例背景：“筑梦乡野”突击队项目概述

2.1 区域概况：古寨镇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挑战

古寨镇位于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南部，是典型的革命老区、山区和农业镇。该镇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但也面临着青年劳动力外流、产业结构单一、公共服务不足等乡村发展的共性挑战。图 1 为古寨镇乡村振兴SWOT分析图。



图1 古寨镇SWOT分析图

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古寨镇是著名的“九连小延安”所在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纵队后续重要力量）的重要根据地，林镜秋等革命先辈在此留下了英勇斗争的足迹。东二支前线指挥所旧址、《大众报》报社旧址、千人大会广场等革命遗迹散布镇内，构成了宝贵的红色教育资源，但也面临着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压力。

生态农业基础良好：镇内拥有水西村（省级“一村一品”蔬菜专业村）等特色农业村，发展丝苗米、蔬菜、嘉宝果、皇帝柑等种植业。如何将农业资源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实现“农文旅”融合，是当地发展的关键课题。

乡村社会结构典型：与许多乡村一样，古寨镇存在一定数量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他们的关爱服务、文化教育与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突出，是乡村社会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

2.2 政策机遇：“百千万工程”与校地合作

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为古寨镇这样的典型乡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该工程强调要推动高校资源下沉，助力县域振兴。在此背景下，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作为省内高水平职业院校，积极响应“双百行动”号召，与古寨镇建立了结对合作关系。“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活动，正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落实“双百行动”、服务地方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缩影。

2.3 主体介绍：“筑梦乡野突击队”

本研究选取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成立的“筑梦乡野”突击队为案例。该组织成立于2021年，初期以短期走访形式开展活动，主要聚焦于红色文化挖掘与传播。随着实践的深入，团队逐渐意识到单一维度的服务难以满足乡村全面振兴的需求，于是在2022年拓展服务内容，增加了产业服务与社会关怀板块。到2023年，团队已形成“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银发关爱、童心守护”的四维整合模式，并与古寨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实现了从“短期走访”到“长期驻点”的转变。这一发展历程体现了团队对乡村振兴需求的深入理解与服务模式的持续优化。

突击队采用“指导老师负责制+学生骨干牵头+跨专业选拔”的组织模式，每年从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选拔30余名学生组成复合型团队。团队内部设立红色文化组、产业服务组、敬老组和支教组四个职能小组，各司其职又协同配合。为保障实践安全有序，团队构建了“学校-学院-指导教师-小组长-队员”的五级安全责任体系，并建立了系统化的培训机制，包括专业技能、乡村认知和安全知识三大模块，确保队员具备服务乡村的专业能力与适应能力。

突击队秉持“扎根乡野沃土，赋能乡村振兴”的使命，以“成为全国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标杆团队”为愿景。在实践中，团队形成了“专业务实，艰苦奋斗；深入基层，精益求精；守正创新，追求卓越”的工作作风，以及“互助友爱，知行合一；担当奉献，协同共进；尊重乡土，永葆初心”的团队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红绿辉映”的核心理念，将红色文化遗产与绿色产业振兴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实践路径。

2.4 合作契机与项目定位

古寨镇丰富的红色、绿色资源与发展需求，与该校管理学院的专业优势、突击队的实践目标高度契合。双方的合作基于以下共识：

对于古寨镇：急需外部智力支持，对红色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现代传播，对生态农业进行创意赋能，同时对“一老一小”群体提供可持续的人文关怀。

对于该校突击队：需要稳定的、有价值的实践基地，将学生的专业知识（如旅游策划、营销、文创、活动组织）应用于真实场景，实现“在做中学”，培养社会责任感和综合职业能力。

因此，突击队在古寨镇的实践定位于：发挥旅游管理等专业特长，以文化为内核，以创新为手段，通过模块化的项目运作，为古寨镇的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其核心活动聚焦于四大板块：挖掘红色文化（红色铸魂）、助力生态农业（绿色赋能）、关爱空巢老人（银发关爱）、守护留守儿童（童心守护）。

3. 实践路径：团队服务古寨镇乡村振兴的四大行动板块

“筑梦乡野突击队”基于古寨镇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充分发挥旅游管理专业优势，构建了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银发关爱、童心守护”为核心的四大行动板块。这四大板块相互支撑，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模式，整体逻辑框架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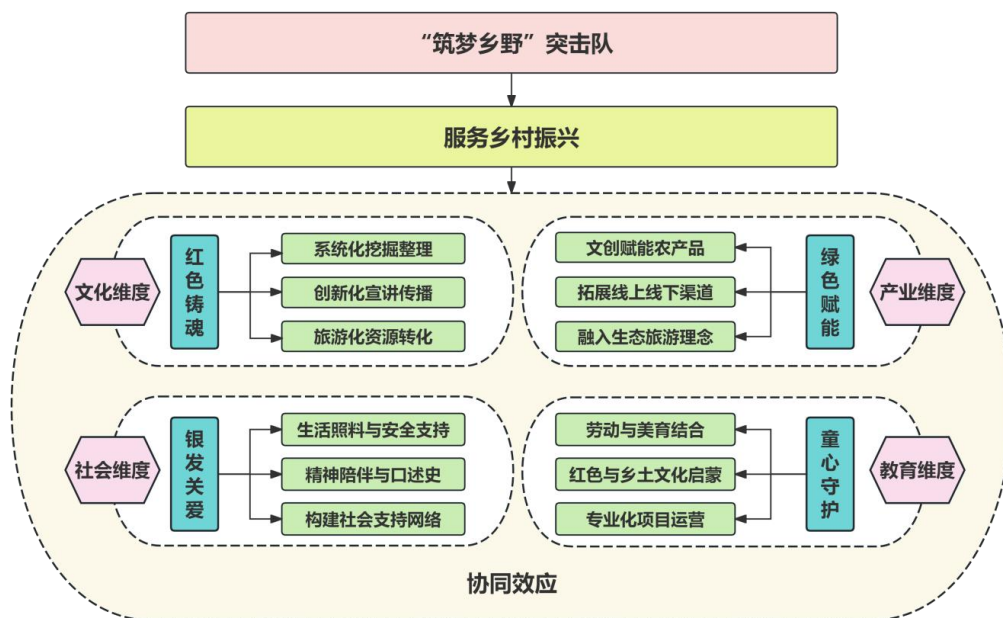


图2 “四维整合”模式逻辑框架图

3.1 红色铸魂：红色旅游资源的创新活化与价值传递

团队将“九连小延安”红色文化的挖掘与传播作为服务古寨镇的首要切入点，通过专业化的创意策划，实现了红色文化从静态保护到动态活化的转变。

系统化的红色文化挖掘与整理。突击队并未满足于简单的参观学习，而是开展了学术化、系统化的文化梳理工作。通过查阅地方志、档案资料，并走访当地老党员、老干部，团队收集和整理了关于林镜秋等革命先辈的口述史，深度挖掘“东二支前线指挥所旧址”、“《大众报》报社旧址”等红色遗迹背后的生动故事。这一过程不仅抢救性地保护了珍贵的红色记忆，也为后续的旅游产品开发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创新化的红色宣讲与内容生产。针对传统红色教育形式单一、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的问题，突击队充分发挥Z世代的创意优势，进行了红色宣讲形式的现代化创新。团队策划并拍摄了《新闻联播》风格的“九连小延安”宣讲视频脚本，通过“主持人现场报道+历史画面重现+人物故事演绎”的叙事方式，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传

播的现代影像产品。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成果（如视频、推文）通过“学习强国”等平台传播，极大地提升了古寨镇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发展红色旅游进行了有效的市场预热。



图3 突击队红色文化挖掘组图

旅游化的红色资源转化与赋能。团队着眼于红色资源的最终转化，尝试将文化挖掘的成果转化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团队规划了以红色遗址为节点的研学旅行线路，并设计了与之配套的讲解词和互动环节。例如，在“千人大会广场”设计升旗仪式体验，在《大众报》旧址模拟新闻印刷工作，使红色教育从“听故事”变为“体验历史”。这一实践直接服务于古寨镇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当地打造了一张鲜明的“红色旅游”名片。

这些系统性工作为古寨镇的红色文化传承带来了实质性的成效。团队完成对8处核心红色遗址的深度梳理，形成数万字的史料汇编；其创新拍摄的宣讲视频被“学习强国”平台采纳发布，一周内获得超2万次点击量与广泛社会好评；团队规划的“红色研学旅行线路”及其核心设计理念已正式被古寨镇政府采纳，纳入镇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当地红色旅游资源从静态保护走向动态活化奠定了关键基础。

3.2 绿色赋能：生态农业资源的创意增值与市场对接

团队利用旅游策划和营销专长，为古寨镇的农业资源注入创意和文化内涵，助力其从传统农产品向旅游商品和体验项目转化。

文创赋能农产品价值提升。突击队针对古寨镇水西村的丝苗米、河东村的嘉宝果等特色农产品，开展了“文创+农业”的实践。团队为农产品设计了一系列兼具乡土气息和现代审美的包装图案和品牌故事，例如，将“稻穗”元素与客家瓷器造型结合，设计了“稻穗瓷碗”等文创产品。这使得普通的农产品变为承载地方文化的旅游伴手礼，显著提升了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团队积极帮助当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在线下，团队策划“田园集市”等活动，将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旅游体验结合。在线上，团队协助运营社交媒体账号，拍摄制作精美的短视频和图文内容，讲述农产品从种植到收获的故事，吸引城市消费群体的关注，探索“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等新型电商模式，为农产品打通了面向更广阔市场的路径。

生态理念融入旅游发展。在整个“绿色赋能”过程中，团队始终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团队在活动中向村民和游客传递生态环保知识，倡导绿色消费，并尝试将生态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等融入旅游线路设计，推动古寨镇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

这些举措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团队设计的5款文创包装已投入量产，帮助农产品线上客单价提升约30%；“田园集市”活动单日吸引游客超500人次，为参与农户带来销售收入近2万元；协助运营的社交媒体账号粉丝量增长超过2000人，发布的助农短视频累计播放量突破10万次，为当地农产品品牌建设注入持久活力。

3.3 银发关爱：面向空巢老人的精准服务与社区融合



图4 突击队服务空巢老人组图

突击队将旅游服务中对“人”的关怀理念，延伸应用到乡村社会治理领域，为空巢老人提供物质与精神并举的精准服务。

生活照料与居家安全支持。基于前期调研，团队制定了详尽的家访计划（如“青春暖阳·守望乡情”活动方案）。团队不仅为老人送去米、油等生活物资，更发挥年轻人的体力优势，帮助老人清扫庭院、整理家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队员们会细心检查药品有效期、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如用电安全），这些细微之处的关怀，体现了服务的专业性和深度。

精神陪伴与情感价值重塑。团队深刻认识到，老人缺乏的不仅是物质，更是精神上

的陪伴。团队通过“倾听大于说教”的原则，鼓励老人讲述人生经历、家风故事，并运用数字化手段帮助老人记录和保存这些珍贵的记忆。这种“口述史”方法，不仅给予了老人情感价值，让团队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需要，也在无形中挖掘和保存了地方的民间文化记忆。

建社会支持网络。团队的活动并非简单的“一次性”慰问。团队通过与村干部、社工建立固定联系，形成了“突击队-村委-社工”联动机制，确保对老人的关爱能够持续。同时，团队通过组织集体活动，促进老人之间的交流，助力重建乡村社区的邻里支持网络，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的文明乡风。

这些关爱行动在社区层面产生了积极而温暖的回响。团队累计服务空巢老人36人次，完成15份详实生动的口述史记录，其中3位老人的故事被整理成文并在当地媒体刊发。建立的“三方联动”机制成功为5户重点关爱老人建立了常态化走访计划，确保了关爱服务的有效延续，获得了村民与地方政府的高度评价。

3.4 童心守护：依托文旅技能的乡村教育创新与启蒙

团队将旅游管理中的活动策划、创意设计能力应用于乡村教育，为留守儿童开设了别开生面的“第二课堂”。

劳动教育与美育启蒙相结合。在“劳动小能手，巧手创美好”支教活动中，团队设计了“扭扭棒手工制作”和“植物拓印”等课程。这些课程将劳动技能培养与审美教育完美融合。孩子们在动手制作创意手工艺品、用当地植物进行拓印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手脑协调能力和创造力，更加深了对家乡自然资源的认知和热爱。

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的启蒙传承。在活动中，团队巧妙地将红色文化和客家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例如，在讲述植物知识时，引入革命先辈在九连山利用中草药的故事；在手工艺制作中，鼓励孩子表现家乡的建筑、风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热爱家乡、传承文化的种子。

专业化项目运营与成效评估。整个支教活动体现了高度的专业性。从前期细致的物资准备（预算表格详尽到每种物品的单价和采购链接）、模拟演练，到活动过程中明确的人员分工（分为教学组、摄影组、后勤组等），再到最后的作品展示评比和活动总结，完全遵循专业的项目化管理流程。这保证了活动的高质量实施，也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

项目管理训练。

这些教育创新实践收获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团队累计为古寨学校200余名留守儿童开展48课时“第二课堂”活动，课程满意度达95%。团队研发的《植物拓印里的家乡美》等3套课程教案因其创新性与适应性，已被古寨学校正式采纳并计划纳入校本美育课程体系，实现了教育帮扶从“输血”到“造血”的实质性转变。

4. 讨论

4.1 构建“四维整合”模型：实现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性路径

基于“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分析，本研究提出“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四维整合模型”，为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该模型构建了多层次、多面向的行动框架，其内在逻辑体现为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与协同增效。在文化维度上，“红色铸魂”通过系统性挖掘与创新性传承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有效保护了乡村文化多样性，更显著增强了乡村文化自信，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动力；这一过程特别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与创造性转化，成功将沉淀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现实价值的教育资本与经济资本。在产业维度上，“绿色赋能”依托专业化的产业服务与创意设计能力，精准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通过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拓展市场渠道，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该维度注重将现代专业知识与传统乡土智慧相融合，实现了产业技术创新与文化价值传承的有机统一。在社会维度上，“银发关爱”通过针对空巢老人的精准服务与情感陪伴，有效缓解了因人口结构变迁带来的乡村社会问题，促进了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理解，为乡村振兴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这一实践在关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时，通过深入的情感联结与口述历史采集，实现了社会服务实践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价值。在教育维度上，“童心守护”通过创新性的教育帮扶与课程开发，为乡村留守儿童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着力培养乡村未来的建设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的人才保障；该维度特别注重将专业教育知识转化为适合乡村儿童认知特点的教学内容，在实现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完成了乡土文化的启蒙与传承使命。

这四个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红色文化为产业赋能提供精神动力，产业振兴为社会服务提供经济基础，社会服务为文化遗产提供情感

纽带，教育帮扶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鲍新龙等，2020；李博，2020）。这种四维整合的实践模式，突破了以往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中“政策比较分散”“工作思路局限”的不足（佛朝晖等，2019），一方面对服务学习理论（Eyler & Giles, 1999）所倡导的“满足人类和社区需求”理念的本土化深化与拓展，即从回应单一、浅层的社区需求升级为系统性地满足乡村在文化、经济、社会与人才方面的复合型需求（朱彦妮，2020）；另一方面，它也是对现有乡村振兴理论的重要补充，有力地论证了文化遗产与社会服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与产业发展、生态宜居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佛朝晖等，2019）；同时也体现了“校地共建”中多元主体协同、多维内容融合的系统思维（马树超 & 郭文富，2018）。该模型为职业院校如何跳出“碎片化”服务模式，通过多维协同实现与乡村发展的同频共振，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4.2 拓展产教融合范式：从“产教结合”迈向“校地共建”

“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对产教融合理论进行了重要拓展。传统产教融合理论主要关注学校与企业的合作，聚焦于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马树超&郭文富，2018）。而“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表明，在乡村振兴语境下，产教融合需要从“产教结合”拓展为“校地共建”，即职业院校与乡村地区的全方位合作。

这种拓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合作对象从单一企业拓展为整个乡村社区，包括政府、村民、企业等多元主体，这与国家推动的“行业企业共建共管的现代产业学院”理念相契合（马树超 & 郭文富，2018），也与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改革方向相一致（石伟平 & 郝天聪，2019）；其次，合作内容从产业对接拓展为文化遗产、社会服务、教育帮扶等多维融合，呼应了将“产业优秀文化元素融入教育教学过程”的育人理念（马树超 & 郭文富，2018），也体现了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中“人才培养与交流模式”的深化（柳友荣 等，2015）；最后，合作目标从满足产业需求拓展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马树超 & 郭文富，2018），也是“将产业发展需求融入专业建设”的延伸。这种“校地共建”新范式，更符合乡村振兴的系统性要求，也为产教融合理论在乡村语境下的应用提供了新视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本科教育在这一拓展过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高职教育相比，职业本科教育具备更强的系统思维和研究能力，能够更好地理解乡村发展的复杂性，设计更加系统化的合作方案。正如马树超与郭文富（2018）所指出的，“深化产教融合要强调搞活市场并规范市场”，而“校地共建”正是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职业本科教育则可在其中发挥理念引领与机制创新的重要作用。

4.3 彰显职业本科价值：在复杂场域中验证高阶能力

本案例为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化发展及其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独特价值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在“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中，职业本科学生与高职学生呈现出清晰的能力互补与差异化贡献谱系。匡瑛和李琪（2021）指出，职业本科在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在层次上属于高等教育，“职业性”和“高等性”是其本质属性。别敦荣（2022）进一步阐明，职业本科是与学术本科、应用本科并列的第三种本科教育类型，其在办学上“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形成为核心”，具有独特的教育要求。突击队的实践，正是对上述理论定位的生动诠释。

在红色文化传承中，职业本科学生能够从历史脉络、文化价值等更宏观的视角进行挖掘与阐释，其宣讲内容展现出更强的思想深度与专业水准。这体现了职业本科教育“基于技术应用与研发的应用学术”特征（匡瑛、李琪，2021），也符合杨欣斌（2022）所强调的，职业本科人才应具备“将技术思维与人文素养相结合”的高阶能力。

在产业赋能方面，学生能够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对乡村产业进行系统诊断，并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这验证了职业本科教育旨在“培养能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生产过程中日益复杂问题情境的专业性技能人才”的定位（吕玉曼、徐国庆，2022），并回应了产业升级对“能够解决系统性、复杂性技术问题”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杨欣斌，2022）。

在社会服务与教育帮扶中，职业本科学生展现出将实践经验系统化、将专业知识教学化的突出能力。这不仅是“坚持理实一体”、“形成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实践导向课程模式”的育人成果（匡瑛、李琪，2021），也彰显了其作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双重角色，能够推动地方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综上所述，“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表明，职业本科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能

够有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与技术应用的创新思维。这一发现不仅从实践层面印证了职业本科的“不可替代性”（匡瑛、李琪，2021），也为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从强化到优化”的类型定位发展路径（吕玉曼、徐国庆，2022）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依据。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主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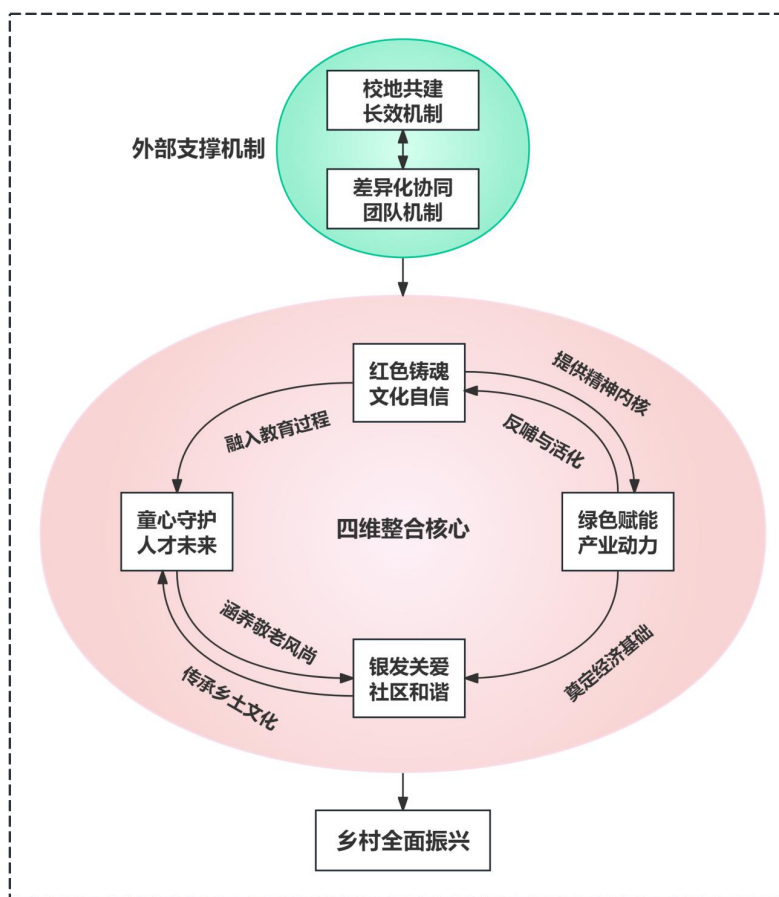


图5 研究核心理论模型

本研究通过深度剖析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案例，揭示了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化路径与内在逻辑，见图 3。首先，构建了“四维整合”系统化服务模式。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红色铸魂（文化维度）、绿色赋能（产业维度）、银发关爱（社会维度）、童心守护（教育维度）”四维整合模式。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三下乡”单一服务局限，实现了文化传承、产业振兴、社会服务与教育帮扶的有机统一，为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系统化路径（鲍新龙等，2020；佛朝晖等，2019）。其次，形成了差异化协同的实施机制。团队通过“指导老师负责制+学生骨干牵头+跨专业选拔”的组织机制，构建了职业本科与高职学生的协同工作模式。职业本科学生主导文化解读、产业诊断、课程设计等高阶任务，高职学生侧重执行与服务，形成了能力互补、协同增效的团队结构（匡瑛 & 李琪，2021）。再次，验证了职业本科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高阶能力价值。职业本科学生在红色文化深度挖掘、产业系统诊断、服务评估与课程设计等方面展现出更强的研究能力与创新思维，体现了职业本科教育“高等性”与“职业性”融合的独特优势（杨欣斌，2022；吕玉曼 & 徐国庆，2022）。最后，拓展了“校地共建”的产教融合新范式。案例表明，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应从“产教结合”向“校地共建”转型，实现学校与乡村在文化、产业、社会、教育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构建长效合作机制（马树超 & 郭文富，2018；石伟平 & 郝天聪，2019）。

5.2 对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启示

基于前述研究发现，结合相关政策与理论视角，本研究进一步凝练出对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启示。职业院校需推动服务路径从单一化向系统化转型，突破传统“三下乡”活动的局限，构建多维协同的服务体系。建议借鉴“农业全产业链”思维（庞馥珊，2025），将红色文化传承、绿色产业赋能、社会服务与教育帮扶有机结合，特别要发挥职业本科院校的“系统性思维和研究能力”优势（马树超、郭文富，2018），设计各维度相互支撑的服务方案，从而实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

构建校地共建的长效合作机制是确保服务可持续性的关键。职业院校应参考“校企命运共同体”理念（石伟平、郝天聪，2019），通过签订合作协议、设立实践基地等方式，实现从短期项目到长期战略合作的转变。特别需要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确保服务内容与乡村需求的动态匹配，最终形成学校、地方政府、村民与企业多方受益的利益共同

体，这是保障合作可持续性的核心要素（鲍新龙等，2020）。

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应从技能传授转向综合能力发展。职业院校应当将乡村振兴要素融入课程体系，着力培养学生的乡村认知能力、文化解读能力和系统规划能力。在此过程中，职业本科教育应突出“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定位（吕玉曼、徐国庆，2022），强化研究能力与创新思维培育；高职教育则侧重“基础性技术技能”培养（匡瑛、李琪，2021），形成层次分明、优势互补的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以成效为导向的多维度评估体系至关重要。职业院校应当借鉴服务学习理论的评价理念（朱彦妮，2020），构建涵盖服务对象满意度、社会影响力、成果转化率等指标的综合评价机制，特别要关注职业本科与高职教育在服务过程中的差异化贡献。有效的评估应当兼顾短期成效与长期影响，既要考察对乡村发展的实际推动，也要评估对学生能力提升的促进效果。

健全跨部门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是推动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建议教育部门与乡村振兴部门建立协同机制，通过制定差异化指导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建立激励机制等举措，为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特别要鼓励职业本科院校发挥引领作用，带动高职院校形成服务合力，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佛朝晖等，2019）。

5.3 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通过系统剖析“筑梦乡野”突击队的实践，实现了三重突破。其一，拓展了产教融合理论的应用边界。研究揭示了在乡村振兴语境下，产教融合需从传统的“产教结合”升维至“校地共建”新范式，其合作对象从单一企业拓展为乡村多元主体网络，合作内容也从产业对接延伸至文化、社会与教育等多维融合，为理解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新视角（马树超 & 郭文富，2018）。其二，丰富了服务学习理论的本土化模式。案例将服务学习（Eyler & Giles, 1999）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深度结合，构建了“乡村服务学习”模式，使社区服务升华为赋能乡村的系统性行动，并清晰呈现了职业本科与高职学生在服务中差异化反思与成长路径（朱彦妮，2020）。其三，构建了“四维整合”系统分析框架。该框架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单一维度局限，将文化、产业、社会与教育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模型，阐明了其协同共生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鲍新龙等，2020）。

在实践价值方面，本研究主要服务于政策制定与多方协同。研究成果为教育部门与乡村振兴部门完善协同支持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建议出台差异化政策，引导职业本科院校在高阶任务中发挥引领作用，并设立专项资金激励“校地共建”长效项目（[佛朝晖等，2019](#)；[彭洪莉 & 朱德全，2022](#)）。同时，研究也为地方政府精准对接高校智力资源、优化“百千万工程”合作路径提供了操作指南。对于学生发展，研究明确了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差异化成长路径：职业本科学生通过主导文化解读、产业诊断等高阶任务锤炼系统思维与创新能力；高职学生则通过高效执行与服务强化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共同实现综合能力的有效提升（[匡瑛 & 李琪，2021](#)）。

5.4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与建议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案例单一性，仅聚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一个典型案例，结论的普适性有待验证；二是时间跨度有限，仅分析连续三年实践，难以全面评估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期效果；三是量化数据不足，质性研究为主，缺乏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的精确测量；四是外部因素考量不足，对政策环境变化等外部变量影响分析不够深入；五是对职业本科教育特点的分析仍显不足，特别是高阶能力形成机制探讨不够系统。

基于上述局限，未来研究应深化多案例比较，构建包含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维度的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并探索数字化技术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创新应用。同时，应加强教育部门与乡村振兴部门协同机制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对职业院校而言，建议将乡村振兴内容融入专业课程体系，建立校地长期合作机制，注重培养学生乡村情感认同，区分职业本科与高职教育的培养重点，探索“专业+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6. 结语

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也是实现其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历史机遇。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筑梦乡野”突击队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职业院校，尤其是职业本科院校，完全有能力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四维整合”路径，

将知识技能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现实力量，在文化遗产、产业振兴、社会服务与教育帮扶的协同共进中，实现服务社会与自我超越的有机统一。

本案例的深层启示在于，它清晰地彰显了职业本科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相较于高职教育，职业本科教育所强调的研究能力、创新思维与系统规划能力，使其团队成员能在红色文化的深度解读与创意转化、乡村产业的系统诊断与方案设计、服务过程的精准评估与课程开发等高阶任务中扮演核心角色。这种“研究者”与“实践者”于一体的双重角色，不仅生动诠释了职业本科“高等性”与“职业性”融合的类型特征（匡瑛 & 李琪，2021），也为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方向。

展望前路，随着职业本科教育的蓬勃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二者的结合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我们期待更多职业院校能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乡土中国，探索出各具特色的服务模式。同时，也呼吁学界与政策层面给予更多关注，共同深化相关理论研究与制度创新，构建更加可持续的校地合作范式，从而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乡村的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 Eyler, J., & Giles, D. (1999). Where's the learning in service-learning? (1st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鲍新龙、张舜、蔡旷（2020）。高校服务地方乡村振兴战略共赢路径探析。《南方论刊》，（11），38-40。
- 别敦荣。（2022）。学术本科、应用本科和职业本科概念释义、办学特点与教育要求。《中国高教研究》，（08），61-68+75。
- 陈建明 & 张理剑。（2022）。职业教育嵌入乡村振兴共生发展的研究。《教育与职业》，（14），103-107。
- 佛朝晖，陈波 & 张平弟。（2019）。职业教育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分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5），60-66。
- 匡瑛 & 李琪。（2021）。此本科非彼本科：职业本科本质论及其发展策略。《教育发展研究》，41（03），45-51。

- 李博. (2020). 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及其推进路径——基于不同人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 *云南社会科学*, (04), 137-143.
- 梁裕 & 韦大宇. (2021).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实现路径. *教育与职业*, (22), 35-40.
- 柳友荣, 项桂娥 & 王剑程. (2015). 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05), 64-68.
- 吕玉曼 & 徐国庆. (2022). 从强化到优化: 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确立的实践路径. *现代教育管理*, (02), 111-118.
- 马树超 & 郭文富. (2018). 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中国高教研究*, (04), 58-61.
- 庞馥珊. (2025). 职业院校“新农人”培育路径研究——基于农业全产业链视域. *教育理论与实践*, 45(30), 25-29.
- 彭洪莉 & 朱德全. (2022).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多维演进与未来图景. *教育发展研究*, 42(19), 31-40.
- 石伟平 & 郝天聪. (2019). 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解读.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07), 93-97.
- 宋亚峰, 范翔瑜 & 陈思吉. (2025). 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强国贡献度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18), 19-28.
- 孙海法, 刘运国, 方琳. (2004). 案例研究的方法论. *科研管理*, (02), 107-112.
- 唐菁菁 & 林孝锴. (2015). 传承与创新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中国教育学刊*, (S2), 7-8.
- 徐春梅 & 吕莉敏. (2022).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价值追求与功能定位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12), 32-37.
- 杨欣斌. (2022). 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探索.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01), 127-133.
- 周名力. (2025).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高职院校服务农村社区教育实践研究. *教育观察*, 14(19), 19-21+38.
- 朱彦妮. (2020). 基于服务学习理论的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探析. *教育与职业*, (17), 40-

45.

卓高生 & 易招娣. (2014). 服务学习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策略探析. *河北学刊*, 34(03), 155-158.

作者简介

杨姗，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旅游、乡村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等。

王宇，硕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辅导员，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职业教育等。

房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旅游、旅游体验、职业教育等。